

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现状与影响因素

——基于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调查分析

李树苗^{1,2,3}, 张丹^{1,2,3}

(1.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安交通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3. 西安交通大学 老龄与健康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是实现农村老年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采用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调查数据,考察养老风险感知的总体水平和结构特征,分析传统家庭保障、社会网络保障和社区保障环境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总体水平较低,分为生存型风险感知和情感型风险感知两个子维度,老年人对于生存型风险的感知水平高于情感型风险;在传统家庭保障因素中,子代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均能有效降低养老风险感知;在社会网络保障因素中,亲戚支持网络能显著降低养老风险感知;在社区保障环境因素中,国家级贫困村和有村级正式养老机构会显著提高养老风险感知,而社区老年活动场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对于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中国农村; 养老风险; 社会保障; 家庭保障; 老年人风险感知; 家庭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13.6; D63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22)01-0047-13

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和家庭结构变迁,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问题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空心村”“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等现象不断出现,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计面临挑战^[1];同时,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或流转,土地收益下降甚至消失,传统土地养老模式遭受严峻冲击^[2];此外,由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的发展尚不充分,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支持较为有限^[3]。在多重劣势累积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问题愈加凸显^[4]。风险本身即为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体^[5],探讨养老风险感知是全面理解养老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问题,不仅对于农村地区防范和应对当前风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助于明确未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方向。

近年来,学界有关养老风险的研究逐渐兴起,但关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现状水平、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综合探讨尚比较匮乏。目前,学界关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相关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角度对养老风险进行成因分析和风险应对规避政策设

收稿日期: 2021-07-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417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207)

作者简介: 李树苗(1963—),男,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丹(1990—),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计^[3,6-8];二是从实证角度以代际支持作为切入点,分析老年人的客观养老风险问题^[9]。事实上,主观建构性是现代风险的突出特点之一,风险感知是风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5,10]。养老风险感知作为一项心理测量指标,是老年人对于养老过程可能发生不利结果的综合感受和判断,连接客观养老风险和风险应对策略的作用,进而与老年生活质量、老年福祉等后果性议题相关联。因而,本文分析养老风险感知的现状,识别养老风险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为提高风险应对政策的瞄准率提供支持,为准确把握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的发展态势奠定基础。

本研究利用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探究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水平和结构特征,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及其子维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并综合农村老年人养老的核心内容和所处现实情境,设计风险感知测量量表,为养老风险研究提供一个有可操作性的测量工具;同时,进一步分析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现状水平和结构特征,考虑到已有研究较少同时考察传统家庭保障、社会网络保障以及社区保障环境等多尺度因素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并将其相关变量纳入模型,通过多层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学界围绕风险感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包括概念界定、理论分析和测量操作化等。风险感知是指在信息有限和不确定的背景下,个人或团体对风险的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5],其理论研究主要有风险的心理测量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和风险的文化理论(The Cultural Theory of Risk Perception)。心理测量范式认为,风险是由受心理、社会和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个人主观定义的,可通过设计量表测量,进行相关分析、因素分析等方法,实现个体风险认知的定量化研究^[5]。风险的文化理论认为,风险的排序、挑选均与社会组织的文化偏好相关联,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只是被人们察觉或意识到的风险增多^[11]。有学者在风险感知的测量方面,提出了风险感知的双因素模型(Uncertainty-Consequences Approach),该模型通过某行为的不利后果可能造成的损失量以及个体对于不利后果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测量风险感知^[12];也有学者进一步拓展这一模型,将风险感知操作化为风险发生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的乘积^[13]。

目前,尽管学界关于风险感知的理论研究相对成熟,但将其运用到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特定研究相对较少。在养老风险感知的测量方面,有学者采用单一条目,如“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吗?”进行测量^[14];还有学者将子代提供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情感支持作为测量指标^[15-17]。在养老风险感知的现状水平方面,有学者认为,农民或农村老年人对于养老问题的总体担忧较低^[4,18-19];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程度较高^[14]。在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方面,学界多数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养老风险感知^[4,14,18]。还有学者探讨了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障,以及社区环境等因素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均为传统单层次模型的实证分析。其中,钟涨宝等^[14]发现,家庭养老保障能力能显著降低养老风险感知,但新农保的作用非常有限;于长永^[4]认为,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家庭规模、家庭存款以及家庭所在区域等因素对养老风险具有显著影响;乐章^[18]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发现,社区经济状况越好、农民越担心养老风险,而社区人际互助关系越差、养老风险感知水平越高。

笔者基于已有研究,认为在养老风险感知方面仍然有一定的拓展空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测量内容。现有研究忽略了传统代际支持之外的风险因子,例如,老年人对于临终照护、后事料理等问题的风险感知。二是测量方法。现有研究中的单一条目测量无法获取风险感知的丰富内容,多条目测量则缺乏同时考察个体对风险发生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的感知。三是多维度因素分析。现有研究较少分析传统家庭内部支持、外部社会网络支持和社区环境保障等多维度、多尺度因

素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四是研究方法。尽管少量现有研究纳入了社区因素,但均采用传统单层次回归模型,忽略了不同层次因素的相互影响,违反了样本间随机误差相互独立的研究假设,可能导致有偏误的估计结果。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需要从养老的核心内容和风险的本质内涵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在养老的内容方面,农村老年人除了需要基本的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农村老年人的孝道期望普遍较高,在临终阶段得到子女的照料尤为重要^[19]。然而,现实条件下,我国农村地区的临终关怀机构和专业照护人员极为匮乏。无论是基于主观偏好,还是客观条件限制,农村老年人在临终阶段得到子女的有效照护均是养老的重要内容之一。二是养老经常与送终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将送终视为第一位,认为送终的意义超过物质供养^[20]。因此,在我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农村地区,老年人对于自己后事能否得到妥善料理的认知,也应当是养老风险感知的重要构成之一。风险的本质是损失的不确定性,隐含了风险不确定性和损失性的基本属性^[21]。风险感知的双因素模型将个体的风险感知分为风险发生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两个维度,其中“可能性”表征了风险的不确定属性,“严重性”反映了风险的损失性属性^[13]。

本文结合农村老年人养老的核心内容和风险感知的双因素模型,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界定为,老年人对于养老过程中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临终护理和后事料理等方面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所发生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的综合认知。

(二)影响因素

本文重点考察传统家庭保障、社会网络保障和社区保障环境对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

1. 传统家庭保障

家庭是个体养老的核心微观系统,是最为重要且最有可能的风险分担网络。农村老年人主要通过家庭获取抵御风险冲击的资源和保障^[21]。传统家庭保障包括子女数量、居住安排、子代提供的代际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我国农村地区,“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观念仍然较为盛行,即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可能越低。居住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和老年人获取代际支持的便利程度。相较于和他人同住,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面临更多挑战,对养老的风险感知可能更高;隔代居住的农村老年人需要承担自我照料和孙子女照料的责任,多重角色压力加重了老年人的照料负担,也可能产生较高的养老风险感知。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和福祉的保护作用在学界已得到充分论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越多,则老年人的养老资源越有保障、养老信心越足,并对养老风险的感知水平越低。

2. 社会网络保障

家庭之外的社会网络保障也可能是影响养老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家庭规模缩小,农村老年人养老必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核心家庭之外的力量,亲戚和朋友等非正式网络的保护作用也不断增强。目前,我国尚无研究探讨核心家庭网络之外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本文将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保障分为亲戚网络和朋友网络。社会护航模型(Social Convoy Model)^[22]强调,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生命历程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不同的功能。我国在宗族观念相对浓厚的农村地区,基于血缘和姻缘形成的亲戚网络规模越大,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可能越低。与亲戚网络的“天然性”不同,朋友网络具有选择性、自愿性和互惠性等特征。农村老年人会主动选择对其最有意义和积极影响

的朋友往来,由此获得较高质量的朋友支持,有效缓解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23]。因此,朋友网络的规模越大,农村老年人对于养老风险的感知水平也会越低。

3. 社区保障环境

社区保障环境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另一重要因素^[4,18]。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基本场域和最主要外在环境,具有地域性和功能性相结合的特征,而且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现实背景下,社区建设的水平直接关系农村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社区提供的公共设施和养老服务水平越高,老年人感知到的养老风险可能越低。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开展的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追踪调查项目。该调查分别开展于2001、2003、2006、2009、2012、2015、2018年;调查对象为安徽农村地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方法,按照乡镇、村两级,以系统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2001年,本研究基期调查设计样本量为1800位老年人,获得有效问卷1715份,应答率为95.3%;2018年,将养老风险感知测量量表加入调查当中。因此,本文采用2018年的调查数据,并在剔除无子女老年人和关键变量缺失样本之后,最终将1096个老年人样本纳入分析研究。

(四) 变量选取

1. 养老风险感知的测量

本文在借鉴已有养老风险感知测量量表的基础上^[4],结合养老风险感知的界定,设计养老风险感知测量量表。一是编制了18个题项的养老风险感知测量量表。邀请50位农村老人完成试测,并通过访谈得到老年人对于风险的一些直观感知,比如“就怕以后得个大病没钱治”“娃都出去打工了,害怕以后动弹不了了没人伺候”等,对量表进行了有效补充。二是综合预调查数据结果和访谈内容,重新修订问卷,删除重复测度指标和非核心测量指标,形成12个题项的测量量表。量表使用李克特5级计分法,每一题项均从可能性感知和严重性感知两个维度提问,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对相应风险发生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的感知水平越高,两维度相乘得到该题项的风险感知总分^①。三是采用临界比例法、相关系数法和内部一致性系数法对量表做条目检验。内部一致性系数法检验发现题项“人老了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区分度较差,故将其删除,其余条目均通过检验,最终共有11个题项进入研究。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量表各题项的可能性感知与严重性感知得分详见表1。

表1 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量表

| 序号 | 问题 | 可能性感知 | 严重性感知 |
|-----|----------------------|-------------|-------------|
| 1. | 老了以后能在一起陪我聊天解闷的人很少 | 2.95(1.396) | 2.70(1.178) |
| 2. | 将来临终的时候没有人在跟前护理我 | 2.19(1.254) | 3.62(1.377) |
| 3. | 老了以后没钱去医院看病或者住院 | 2.68(1.329) | 4.06(1.433) |
| 4. | 老了以后没人帮我干家务活了 | 2.60(1.344) | 2.82(1.242) |
| 5. | 要是子女不要我了,我自己没钱去住养老院 | 1.98(1.232) | 3.03(1.493) |
| 6. | 我感觉老了以后很容易被其他人孤立 | 2.62(1.300) | 2.62(1.165) |
| 7. | 将来没有人负责给我料理后事 | 1.61(0.951) | 3.73(1.551) |
| 8. | 老了以后子女都不给我生活费了 | 1.81(1.049) | 3.87(1.447) |
| 9. | 老了以后子女都不愿意听我讲心里话了 | 2.52(1.280) | 2.64(1.204) |
| 10. | 万一生病住院了,可能到时候没人照顾伺候我 | 2.04(1.158) | 4.18(1.432) |
| 11. | 我觉得老了以后变得和其他人越来越疏远了 | 2.81(1.363) | 2.69(1.188) |

① 考虑到部分农村老人由于常年风险累积,已经处于量表题项所描述的风险状况,因此在“可能性”维度设置选项6,表示“已经发生”;为了最大化利用有效样本,在后续研究中将答案选择选项6与选项5的样本合并处理;稳健性检验在剔除选择“已经发生”的样本后发现结果与现有结果一致。

2. 养老风险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

(1)传统家庭保障因素。该因素包括子女数量、居住安排、子代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子女数量即现存活的所有子女数;居住安排分为独居、仅与配偶居住、仅与孙子女居住(隔代居住)和其他居住形式;经济支持是过去一年老年人从所有成年子女处获得的现金和实物支持的总值;生活照料是过去一年是否获得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包括洗衣服、洗碗、打扫卫生等)和生活起居照料(包括洗澡、穿衣等),通过“0 = 否; 1 = 是”测量;情感支持通过询问老年人与子女情感的亲近状况、相处状况和是否愿意倾听心事,三个题项加总之后得到情感支持总分,得分越高,则表示老年人和子女的情感支持水平越高。

(2)社会网络保障因素。该因素采用社会网络量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6, LSNS-6)^[24]测量,分为亲戚网络和朋友网络两个子量表,分别有三个题项,如询问老年人认为可以每月至少来往一次、可以放心讨论私事、可以提供帮助的亲戚和朋友人数,其中亲戚网络和朋友网络的加总得分均在0~15之间,得分越高表明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847和0.883。

(3)社区保障环境因素。该因素包括是否为国家级贫困村、是否有社区正式养老机构、是否有社区老年活动场所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数量。其中,是否为国家级贫困村反映了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础性条件;社区是否有正式养老机构,体现了社区能否为老年人提供正式的照料场所;有否有社区老年活动场所以及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则反映了社区老年相关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可及性。

3. 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村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特征(受教育水平、年收入)和健康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病、自评健康、抑郁倾向得分)。农村老年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定义和描述统计信息详见表2。

(五)研究方法

本文在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识别养老风险感知的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计算风险感知水平,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之后,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以养老风险感知及其子维度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传统家庭保障、社会网络保障和社区保障环境因素对于养老风险感知及其子维度的影响效应。在具体分析中,本文将老年人的传统家庭保障因素和社会网络保障因素设为层一,在层二的截距模型中纳入随机变量,以控制同一社区(村)老年人在养老风险感知方面的一致性,消除社区(村)的整群效应,模型如公式(1)~(3)。

$$Y_{ij} = \gamma_{00} + v_{0j} + \varepsilon_{ij} \quad (1)$$

$$ICC = \frac{\sigma_{v_0}^2}{\sigma_{v_0}^2 + \sigma_{\varepsilon}^2} \quad (2)$$

$$Y_{ij} = \gamma_{00} + \gamma_{01}C_{1j} + \gamma_{10}X_{1ij} + \gamma_{20}X_{2ij} + v_{0j} + \varepsilon_{ij} \quad (3)$$

公式(1)为零模型(null model), γ_{00} 表示总均值或总截距,为固定参数; v_{0j} 为社区层面的随机变量,即样本点 j 到总截距的距离,表示来自不同社区(村)的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均值的差异; ε_{ij} 为农村老年人个体层面的随机变量,即分布于 j 样本点的 i 样本到该样本点的截距的距离。零模型中不纳入任何自变量,通过公式(2)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检验多层模型的适用性。公式(3)为随机截距模型。其中, Y_{ij} 为社区(村) j 个体 i 的养老风险感知或其子维度的平均水平; γ_{00} 代表总平均值或总截距; C_1 、 X_1 、 X_2 分别代表传统家庭保障、社会网络保障和社区保障环境因素, γ_{01} 、 γ_{10} 、 γ_{20} 分别为各因素的回归系数; v_{0j} 为社区层面的随机截距项(random intercept); ε_{ij} 为随机误差项。

表2 农村老年人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N = 1 096)

| 变量 | 定义/赋值 | 比例/均值 | 标准差 |
|-------------|-------------------------|--------|-------|
| 自变量 | | | |
| 传统家庭保障 | | | |
| 子女数量 | 1~8 | 3.105 | 1.302 |
| 居住安排 | | | |
| 独居 | | 18.07% | |
| 仅与配偶住 | | 46.35% | |
| 隔代居住 | | 28.47% | |
| 其他 | | 7.12% | |
| 代际经济支持 | 取对数 | 7.602 | 2.426 |
| 代际生活照料 | 0 = 无; 1 = 有 | 34.49% | |
| 代际情感支持 | 0~48, 得分越高表示情感支持水平越高 | 16.027 | 7.627 |
| 社会网络支持 | | | |
| 亲戚网络 | 0~15, 得分越高表示亲戚网络规模越大 | 5.424 | 3.468 |
| 朋友网络 | 0~15, 得分越高表示朋友网络规模越大 | 4.606 | 3.790 |
| 社区保障环境 | | | |
| 国家级贫困村 | 0 = 否; 1 = 是 | 10.77% | |
| 社区(村)养老机构 | 0 = 无; 1 = 有 | 17.70% | |
| 社区(村)老年活动场所 | 0 = 无; 1 = 有 | 47.35% | |
| 社区(村)医疗卫生机构 | 0~5 | 1.211 | 0.858 |
| 控制变量 | | | |
| 年龄 | 60~94岁 | 70.716 | 7.761 |
| 性别 | 0 = 男性; 1 = 女性 | 47.35% | |
| 婚姻 | 0 = 不在婚; 1 = 在婚 | 75.91% | |
| 教育程度 | 0 = 未上过学; 1 = 上过学 | 39.51% | |
| 年收入对数 | 代际经济支持之外收入取对数 | 8.793 | 1.250 |
| 慢性病 | 0 = 无慢性病; 1 = 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 | 78.92% | |
| 自评健康 | 1~4, 得分越高表示自评健康水平越高 | 2.446 | 1.002 |
| 抑郁得分 | 0~17, 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水平越高 | 5.152 | 3.787 |

三、研究结果

(一) 探索性因子分析

养老风险感知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详见表3, KMO 检验值为0.920, Bartlett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5 843.137 (df = 55, P 值 = 0.000), 说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 (Varimax) 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2个, 所有题项在其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45, 2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7.43%。因此, 养老风险感知可简化为2个维度, 维度1包括题项2、3、4、5、7、8、10, 主要涵盖老年人在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临终照料和身后料理方面的风险感知, 这类风险本质是经济性和照料服务性的, 与维持老年人基本生活的正常运转紧密相关, 故命名为生存型风险感知。维度2包含题项1、6、9、11, 主要包括了农村老年人所感受到的在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等方

面的风险,命名为情感型风险感知。

表3 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因子分析

| 序号 | 养老风险感知量表题项 | 载荷量 | |
|----|----------------------|---------|---------|
| | | 生存型风险感知 | 情感型风险感知 |
| 2 | 将来临终的时候没有人在跟前护理我 | 0.694 | |
| 3 | 老了以后没钱去医院看病或者住院 | 0.669 | |
| 4 | 老了以后没人帮我干家务活了 | 0.580 | |
| 5 | 要是子女不要我了,我自己没钱去住养老院 | 0.713 | |
| 7 | 将来没有人负责给我料理后事 | 0.723 | |
| 8 | 老了以后子女都不给我生活费了 | 0.785 | |
| 10 | 万一生病住院了,可能到时候没人照顾伺候我 | 0.756 | |
| 1 | 老了以后能在一起陪我聊天解闷的人很少 | | 0.736 |
| 6 | 我感觉老了以后很容易被其他人孤立 | | 0.786 |
| 9 | 老了以后子女都不愿意听我讲心里话了 | | 0.554 |
| 11 | 我觉得老了以后变得和其他人越来越疏远了 | | 0.825 |
| | 特征值 | 5.581 | 1.211 |
| | 累积方差贡献率(%) | 38.16 | 57.43 |

注:仅保留因子载荷在0.45及以上的因子。

农村老年人养老感知的总体水平和分维度得分由表4可知,养老风险感知得分为30.17。这说明,我国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得分在0~100之间)。从分维度来看,生存型风险感知得分35.53,情感型风险感知得分26.79。这表明,我国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以生存型风险感知为主^[4,7]。

表4 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及子维度得分

| 总体养老风险感知 | 养老风险感知子维度 | |
|----------|-----------|---------|
| | 生存型风险感知 | 情感型风险感知 |
| 30.17 | 35.53 | 26.79 |

注:为便于比较,将原始公因子得分(其均值为0,方差为1)按照公式:新分值=[(因子值-因子值最小值)/(因子值最大值-因子值最小值)×100]转换为0~100的值,养老风险感知得分以2个公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比例为权重计算得出。

(二)量表信效度检验

量表信度通过量表总分和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以及分半信度两个指标检验。结果发现,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介于0.777~0.911之间,分半信度结果在0.763~0.899之间,说明量表信度良好。

量表效度通过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两个指标检验。结构效度使用维度与维度、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两个子维度之间的相关为0.500,两个子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分别为0.625和0.780。子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大于子维度彼此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维度之间既相互独立又能较好反映所要测量的特质,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内容效度通过各题项与其所属维度的相关系数检验,发现结果在0.535~0.830之间($p < 0.01$),各题项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164~0.439之间($p < 0.01$)。量表各题项与所属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大于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内容效度检验通过。

(三) 多层线性模型回归

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5。本文根据公式(2) 计算得到组内相关系数(ICC)为 0.243,说明 24.3% 的方差变异由社区(村)间的组间差异引起,处在同一社区(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社区因素是影响养老风险感知的重要变量,因此有必要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以提高参数估计的准确性。

表 5 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多层线性回归结果

| 变量 | 养老风险感知 | | | 生存型 风险感知 | 情感型 风险感知 |
|--------------|----------------------|----------------------|----------------------|----------------------|----------------------|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 自变量 | | | | | |
| 传统家庭保障 | | | | | |
| 子女数量 | 0.114** (0.048) | 0.106** (0.048) | 0.107** (0.048) | 0.176*** (0.063) | -0.002 (0.086) |
| 居住安排(独居) | | | | | |
| 仅与配偶住 | 0.169 (0.111) | 0.164 (0.111) | 0.161 (0.111) | 0.186 (0.147) | 0.122 (0.201) |
| 隔代居住 | 0.193* (0.105) | 0.194* (0.104) | 0.184* (0.104) | 0.245* (0.138) | 0.085 (0.189) |
| 其他 | 0.156 (0.125) | 0.158 (0.124) | 0.141 (0.124) | 0.285* (0.165) | -0.083 (0.225) |
| 经济支持 | -0.041*** (0.012) | -0.036*** (0.012) | -0.037*** (0.012) | -0.050*** (0.016) | -0.016 (0.021) |
| 生活照料 | -0.196*** (0.063) | -0.190*** (0.063) | -0.185*** (0.062) | -0.314*** (0.082) | 0.025 (0.113) |
| 情感支持 | -0.036*** (0.008) | -0.032*** (0.008) | -0.033*** (0.008) | -0.048*** (0.011) | -0.008 (0.014) |
| 社会网络支持 | | | | | |
| 亲戚网络 | | -0.025** (0.010) | -0.024** (0.010) | -0.022* (0.013) | -0.026 (0.018) |
| 朋友网络 | | 0.001 (0.009) | 0.002 (0.009) | 0.033 (0.112) | -0.046*** (0.016) |
| 社区保障环境 | | | | | |
| 国家级贫困村(否) | | | 0.351* (0.197) | 0.680*** (0.247) | 0.170 (0.324) |
| 社区(村)养老机构(无) | | | 0.512*** (0.196) | 0.646*** (0.244) | 0.291 (0.320) |
| 社区(村)老年活动场所 | | | 0.141 (0.140) | 0.171 (0.175) | 0.092 (0.229) |
| 社区(村)医疗卫生机构 | | | -0.125 (0.095) | -0.151 (0.118) | -0.081 (0.154) |

续表 5

| 变量 | 养老风险感知 | | | 生存型 风险感知 | 情感型 风险感知 |
|------------------|----------------------------------|----------------------------------|----------------------------------|----------------------------------|---------------------------------|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模型 4 | 模型 5 |
| 控制变量 | | | | | |
| 年龄 | -0.008 [*] (0.005) | -0.010 ^{**} (0.005) | -0.010 ^{**} (0.005) | -0.012 ^{**} (0.006) | -0.006 (0.008) |
| 性别(男性) | -0.013 (0.060) | -0.001 (0.060) | 0.002 (0.060) | 0.067 (0.080) | -0.103 (0.109) |
| 婚姻(不在婚) | -0.032 (0.104) | -0.032 (0.104) | -0.029 (0.104) | 0.046 (0.138) | -0.145 (0.188) |
| 教育程度(未上学) | 0.004 (0.061) | 0.012 (0.061) | 0.015 (0.061) | 0.038 (0.081) | -0.029 (0.111) |
| 年收入对数 | -0.079 ^{***} (0.025) | -0.078 ^{***} (0.025) | -0.078 ^{***} (0.025) | -0.090 ^{***} (0.034) | -0.060 (0.046) |
| 慢性病(否) | -0.024 (0.072) | -0.037 (0.072) | -0.037 (0.072) | 0.010 (0.095) | -0.107 (0.130) |
| 自评健康 | -0.071 ^{**} (0.034) | -0.063 [*] (0.034) | -0.065 [*] (0.033) | -0.043 (0.044) | -0.099 (0.061) |
| 抑郁得分 | 0.103 ^{***} (0.009) | 0.103 ^{***} (0.009) | 0.103 ^{***} (0.009) | 0.093 ^{***} (0.012) | 0.120 ^{***} (0.016) |
| 截距项 | 2.997 ^{***} (0.121) | 3.000 ^{***} (0.121) | 3.642 ^{***} (0.373) | 3.310 ^{***} (0.492) | 4.162 ^{***} (0.670) |
| 组间方差 | 0.262 (0.055) | 0.259 (0.055) | 0.215 (0.046) | 0.327 (0.073) | 0.550 (0.123) |
| 组内方差 | 0.711 (0.031) | 0.740 (0.032) | 0.703 (0.031) | 1.236 (0.054) | 2.319 (0.102) |
| Log likelihood | -1 433.22 | -1 425.30 | -1 419.81 | -1 724.85 | -2 066.81 |
| Observations | 1,096 | 1,096 | 1,096 | 1,096 | 1,096 |
| Number of groups | 64 | 64 | 64 | 64 | 64 |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模型 1 分析了传统家庭保障因素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女数量、居住安排、子女提供的代际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其中,子女数量显著增加了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这可能是因为:一是子女数量仅代表潜在的照料者人数,子女数量越多,发生代际冲突和矛盾的可能性越高,子女之间也越可能出现相互推诿照料父母等问题,由此提高了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二是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需要投入的财物成本、时间和精力也越多。特别是随着农村彩礼上涨,老年父母可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4]。这种“代际剥削”使得老年人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进而增加了老年人对于养老风险的感知。隔代居住安排也加剧了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这可能是因为隔代居住安排之下的老年人需要承担照料孙辈的角色,由此产生多重角色紧张的心理压力,因此提高了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均能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表明相较于子女数量,子女

为老年父母提供的各项实质性的代际支持更有助于缓解其养老风险感知。

模型2在传统家庭保障因素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网络支持因素,分析亲戚网络支持和朋友网络支持对于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亲戚网络支持有助于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而朋友网络的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在“家本位”理念盛行的农村地区,基于血缘或亲缘形成的亲戚网络支持是老年人获取支持和帮助的重要来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对于养老风险的感知。然而朋友支持网络在降低总体养老风险感知的作用方面还较为有限。

模型3进一步引入了社区环境因素,是养老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完整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前两类因素在模型3中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方向与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不同层次的因素对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具有相互独立的影响。通过比较Log likelihood值发现,模型3的拟合度最好,进一步证明有必要同时考察传统家庭保障、社会网络保障和社区环境因素对于养老风险感知的可能影响。在社区环境因素中,处在国家级贫困村、社区(村)有正式的养老机构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

模型4和模型5是因变量分别为生存型风险感知和情感型风险感知的多层线性回归结果。从模型4的结果来看,代际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以及社会网络中的亲戚支持网络等均显著降低了农村老人的生存型风险感知。模型5的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的情感型风险感知主要受到社会支持网络因素的影响。朋友支持网络规模越大,农村老年人的情感型风险感知水平越低。

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年收入、自评健康、抑郁得分是影响养老风险感知的显著变量。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4],年龄与养老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根据“年龄成熟效应”,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更能适应生活中的各种遭遇,心态更为平和,因此对于风险的感知反而降低。经济收入越高、自评健康越好,农村老年人的风险感知越低;抑郁水平越高,风险感知也越高,以上结果说明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和健康状况会对其养老风险感知产生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进一步加剧,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高出城市近8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养老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地区,而刻画农村老年人这一庞大人群对自身养老风险的主观认知,对进一步厘清农村地区养老困境、设计规避和降低养老风险的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作用。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及其子维度的现状、水平和主要影响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的结论。

1.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较低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主要包括生存型风险感知和情感型风险感知两个子维度,老年人对于前者的感知水平高于后者。养老风险感知总体水平较低可以通过风险文化理论解释,纵向的时间比较和横向的社会比较共同形塑了农村老年人对于养老风险的认知。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几乎都经历了历史上的困难时期,现在享受到了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加上农村老人生活简朴、养老需求不高,因此风险感知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子代照料可及性降低和情感交流减少的现象非常普遍,老年人对该类风险的认知敏感度较低,也会产生较低的风险感知。生存型风险感知高于情感型风险,表明农村老年人主要担忧的是经济和照料等刚性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研究结果说明,规避和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重点在于增加老年人的经济储备并提供充足的生活照料支持。

2. 传统家庭保障和社会网络保障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

子代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能显著降低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说明代际支持仍然是农村老人获取养老保障的重要来源。研究结果还发现,社会保障网络中的亲戚网络能有效降低生存型风险感知,朋友网络则能降低情感型风险感知。在中国传统“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情境中,亲戚网络可以视为核心家庭网络的延伸。特别是受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影响,亲戚网络的作用越发凸显,其规模越大,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越有保障,感知到的生存型养老风险越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发现朋友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的情感型风险感知,反映出朋友网络在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慰藉、疏导帮助以及支持鼓励等情感支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社区保障环境也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

国家级贫困村和村级正式养老机构均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社区老年活动场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则对养老风险感知及其子维度并无显著影响。处在国家级贫困村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总体养老风险感知和生存型风险感知,说明社区(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老年个体对于自身养老风险的认知。社区(村)有正式养老机构也会提高养老风险感知,这一结果似乎与常理不符。事实上,有关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并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机构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相背离^[25]。农村老年人认为只有没有依靠或子女不孝的老人才会去住养老院,出于对乡土社会舆论的恐惧,极易产生对养老机构的抵触心理。本文由此推断,如果社区(村)有养老机构,那么老年人更有可能被子女送去机构养老,而无法实现在家养老的心愿,反映在心理层面即表现为较高的养老风险感知。这一结果从侧面证实了当前政策将机构养老定位为“补充地位”是符合农村老年人主观心理感受的。此外,社区老年活动场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对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及其子维度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基本养老公共服务在降低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方面发挥的作用还非常有限。

(二) 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人口在老龄化不断加速的现实背景下,传统家庭支持弱化所造成的不足尚未得到国家和市场的有效替代,农村老年群体面临生存型和情感型双重养老风险。我国应在养老风险衍生出更为严重的社会风险之前,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规避和控制风险。为此,本文提出四方面的政策建议。

1. 发挥政府的宏观支持作用

一是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提高福利供给水平,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村庄集体收入和公共资金,将资金补贴切实用于高养老风险群体,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正常运转,降低生存型养老风险。二是各级政府要继续推进农村老年服务设施建设和老年服务人才培养,发挥基层社区功能,使农村社区真正起到降低养老风险、保障老年生活的作用。三是政府要加快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建设,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等方式鼓励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便于向老年父母提供代际支持。四是政府要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对日渐弱化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进行重构,进一步规范老年人赡养、照护责任;积极倡导和宣传新时代孝道观念,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的社会氛围。

2. 发掘农村社区内部的养老服务供给潜能

我国农村地区本质上属于“熟人社会”,但核心家庭之外的亲戚支持网络和朋友支持网络能够有效降低农村老年人的生存型和情感型风险感知。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和挖掘核心家庭之外的亲戚和朋友网络的潜力,缓解由于子女外出务工等原因给老年人造成的精神孤独和情感寂寞。各地农村应结合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情况,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建立日间照料中心、互助幸福院、老年之家等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组织,培养互助养老的理念,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老年人主动参与,实现自助和互助养老。

3. 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

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照料帮助和精神关爱等,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家庭作为农村养老服务的核心供给源,在缓解养老风险方面仍然发挥关键作用,而子代需要关注老年人的各项需求,加大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照料帮助。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倡导子女为老年父母创造接触网络的途径,帮助老年人掌握各类终端设备的基本使用方法,通过智能手机等终端与子代沟通交流,缓解心理孤独感,降低情感型风险感知。

4. 强化农村人群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防范意识

人在老年阶段的养老风险是个体生命历程劣势累积结果的体现。从风险预防和规避的角度看,我们需要从全生命周期重视养老风险问题,个体在青壮年时期开始即注重养老资本(如健康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的积累和储备,以增强老年期的养老风险抵御能力;对于已经迈入老年期的老人而言,在身体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外出务工等方式增加物质储备,提高经济独立性,实现“有备而老”;同时,老年人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积极主动参加所在社区(村)的文化活动,增加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实现降低养老风险、提升老年福祉。

参考文献:

- [1] 李树茁,徐洁,左冬梅,等.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7,4(39):1-10,124.
- [2] 张会萍,胡小云,惠怀伟.土地流转背景下老年人生计问题研究——基于宁夏银北地区的农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6(3):56-67.
- [3] 陆杰华,张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探究——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视角[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32):8-14.
- [4] 于长永.他们在担心什么?——脆弱性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与养老期望探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32):22-31.
- [5] 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M].赵延东,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210.
- [6] 邓大松,陈文娟,王增文.论中国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J].经济评论,2008(2):87-90.
- [7] 徐俊,风笑天.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责任与风险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2,5(18):2-10.
- [8] 穆光宗.低生育时代的养老风险[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32):1-7.
- [9] 刘成斌,高翔.劳动力外流对城乡养老风险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8(3):51-61,127.
- [10]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11] 王郅强,彭睿.西方风险文化理论:脉络、范式与评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5):1-9.
- [12] CUNNINGHAM S. The major dimensions of perceived risk. In: D. Cox (Ed.), Risk Taking and Information Handling in Consumer Behavi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67.
- [13] 张硕阳,陈毅文.消费心理学中的风险认知[J].心理科学进展,2004(2):256-263.
- [14] 钟涨宝,李飞,冯华超.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5省1573个样本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6(6):72-81.
- [15] 王树新,张戈.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担心度研究[J].人口研究,2008(4):79-85.
- [16] 张戈.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焦虑[J].人口与经济,2008(S1):39-41.
- [17] 张冲,朱鹏,童峰.基于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法的农村老年人养老担心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为例[J].农业经济,2013(8):88-90.
- [18] 乐章.风险与保障:基于农村养老问题的一个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9):68-73.
- [19] 徐俊.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6(3):73-82.
- [20] 姚远.养老:一种特定的传统文化[J].人口研究,1996(6):30-35.
- [21] 冯必扬.社会风险:视角、内涵与成因[J].天津社会科学,2004(2):73-77.

- [22] ANTONUCCI T C, AJROUCH K J, BIRDITT K S. The convoy model: Explaining social relations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 2014, 54(1): 82-92.
- [23] 唐丹, 姜凯迪. 家庭支持与朋友支持对不同自理能力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5, 13(1): 65-69.
- [24] LUBBEN J, BLOZIK E, GILLMANN G, et al. Performance of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among three Europea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 populations[J]. *The Gerontologist*, 2006, 46(4): 503-513.
- [25] 吕雪枫, 于长永, 游欣蓓. 农村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 12 个省份 36 个县 1 218 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8(4): 102-116.

Status and Determinants of Older Adults' Risk Perception of Old-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Anhui Survey

LI Shuzhuo^{1,2,3}, ZHANG Dan^{1,2,3}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3. Center for Aging and Health Researc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Rural Elderly's Well-Being in Anhui Province,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perception of old-age support risk among older adults in rural China, and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family support,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risk perception as well as its sub-dimens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perception of old-age support risk among rural older adults is relatively low and consists of two sub-dimensions: survival risk perception and emotional risk perception, and the level is higher in the former than in the latter. Among the traditional family support factor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living in skipped generation households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isk perception levels; the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instrument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risk perception.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e perception of old-age support risk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national-level poor villages or in the village nursing homes. In addition, community activity centers and health care facilitie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erception of old-age support risk and its sub-dimensions. Furthermo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erception of survival risk and emotional risk: the family network is linked to lower levels of survival risk, and the friend network is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risk.

Key words: rural China; elderly support risks; social security; family support; elderly's risk perception; family structure change

(责任编辑: 冯 蓉)